

編輯台簡報

本期的「**比較文學學科論辯文獻**」，簡短介紹 Edward W. Said 為 Erich Auerbach 《模擬論》（*Mimeses*）出版五十周年所撰寫的一篇導論，將其視為可以介入比較文學屬性辯論的參考素材，因為這篇文章（乃至於 Said 本人著述）所觸及的語言文字學方法，是個與目前流行的世界文學派大相逕庭的選項。「**進行中研究**」持續邀請會員中新銳學者分享正在發想或執行的研究：中山大學外文系李祁芳老師以文學傳記與微歷史雙軌方法研究文藝復興時期一個看似次要的劇作家，以小窺大，從個人小史探看大時代軌跡；東吳大學英文系蘇秋華老師貫穿哲學、科技批判論、電影技術史，踏入維多利亞時期的魔術世界，嘗試在光電幻影中重探身體與科技的關係。新闢的「**讀書筆記**」，則有淡江大學法文系蔡淑玲老師近日讀書心得，重看她所熟悉的左拉；點到之處，幾乎涵蓋了結構主義以來諸家理論拋出的提問。「**活動紀錄**」則附錄文化大學大傳系林純德老師在「同志生活作為方法」論壇上對康文慶老師演講做出的回應摘要。

比較文學學科論辯文獻

Said, Edward W. "Erich Auerbach, Critic of the Earthly World." *boundary 2* 31.2 (2004): 11-34.

Erich Auerbach 的《模擬論》（*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是二十世紀極為重要（也極為好看）的文學史著作：除了作者從荷馬（Homer）史詩一路寫到現代主義的博古通今令人讚佩，書中一以貫之的去位階、去分化的人本思想，也讓人印象深刻。該書英文版於 1953 年面世。2003 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特別推出了《模擬論》五十周年紀念版，由 Edward W. Said 撰寫序言。本篇即為該文重刊版，收錄於 *boundary 2* 2004 年夏季號所製作的「批判性世俗主義」（Critical Secularism）專號——專號原始設計是要探討 Said 所代表的當代世俗主義批判方法（secular criticism），未料 Said 在 2003 年秋天驟逝，卻也讓專號成了一個及時的紀念特輯（見 Mufti, "Critical Secularism"）。

Said 這篇序論並未直接介入比較文學學科辯論，然而 Said 深入剖析 Auerbach 這位對他影響至深的文學家的學術內涵，尤其是其語言文字學（philology）底蘊、及其文本人文主義，不免讓人有興趣思索：Auerbach 所代表的比較文學早期傳統——對文本細節的關注——能否為今日的比較文學帶來些許啟發，或至少成為此刻比較文學危機論爭的參考資料；此外，Said 個人在晚年的語言文字學轉向，和他一直以來堅持的人本理念以及對身份政

治的質疑，是否可以被視為當代比較文學的選項之一。比較文學的語言文字學脈絡，與現下那些考量「流通性」（circulation）、「文化通識」（cultural literacy）的「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在取徑上是明顯不同的。近年一直有學者主張重返語言文字學傳統（例如本報第 3 期介紹的 Emily Apter），或者提出類似的「回到文本」的主張（例如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Said 這篇為 Auerbach 而寫的導論文字若能被置放於這個討論框架內，其當代性以及它與比較文學的關係將更為顯著。

Said 並未漠視西方語言文字學對於歷史上東方主義（Orientalism）及歐洲文化帝國主義的促長功用，也並不否認 Auerbach 的「歐洲」（European）甚或「歐洲中心」（Eurocentric）趨向；然而他更想強調的，是 Auerbach 語言文字學對於文字細部的注意，以及背後的人本意義。Said 在文中幾度以「同情」（sympathy）來解釋這種對於「文本實際說了什麼」（而非僅是「文本暗示了什麼」）的在意（Said 13），但這絕非止於細瑣的文字考究；Said 說，Auerbach 承續的，是德國派詮釋語言文字學（hermeneutical philology）對於異文化、異語言細節的好奇與關切，但 Auerbach 更進一步將如此歐洲中心的固有傳承轉化成為一個超離歐洲的開放性可能，相信人是有辦法理解他者的，儘管現代國族主義與文化本位主義已將世界切割地支離破碎。

Auerbach 在乎文本本身說了什麼，而寄託在此閱讀功夫背後的，乃是深厚的人本思維；此人本語言文字學方法最精華處莫過於他的「喻形詮釋法」（figural interpretation）。「喻形」（figura）原是聖經詮釋學中的關鍵詞，指的是舊約中的人物或事件如何預示新約中近似人物或事件的到來，但 Auerbach 將喻形

詮釋用於他對但丁(Dante)《神曲》(*The Divine Comedy*)的創意解讀：以 Auerbach 的說法，但丁藉由著墨地獄(*Inferno*)中受罰之人的情感細節，讓這些人物的心理轉折有完整的鋪陳，使他們的過去(生前所為)最後落實於現在——這個「現在」指的不僅是他們在地獄中受懲的項目，更包括他們此時的人性戲劇；而他們此刻所流露的情感層次變化，也成為或是預示了他們的永恆救贖。如此，但丁的地獄便不再是神旨的刻板搬演，而是一幅具有歷史性的世俗圖像。

Auerbach 的這個面向，讀者並不陌生，但更值得注意的恐怕是 Said 本人從 Auerbach 式人文主義得到了何種啟發，乃至於發展出屬於他的時代的世俗主義理想，而這條路徑，與他的東方主義批判、文化帝國主義批判之間，又是何種關係。也因此，如果要更透徹 Auerbach 式傳統對當代比較文學的意義，可能必須一併探討 Said 本身的著述，尤其是後者對於他者文化、對知識生產政治、對普同人權的看法，以期判斷 Said 是否也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面對當前人文難題的解法。關於這一點，早有學者指出(見 Apter; Mufti, “Auerbach in Istanbul”)，Said 的世俗主義脈絡，一直未受到正視，或者一直受到其他立論(例如「Said 的菁英世界主義」、「Said 的傅柯式系譜方法」)的干擾。此外，*boundary 2* 在 2010 年秋季號製作了一個語言文字學專輯(由 Daniel T. O’Hara 主編)，重申語言文字學如何是世俗主義批判方法的重要支撐；這也應該被視為相關的比較文學反思素材。

引用書目

Apter, Emily. “Sadian Humanism.” *boundary 2* 31.2 (2004): 35-53.

Mufti, Aamir R. “Auerbach in Istanbul: Edward Said, Secular Criticism, and the Question of Minority Culture.” *Critical Inquiry* 25.1 (1998): 95-125.

---. “Critical Secularism: A Reintroduction for Perilous Times.” *boundary 2* 31.2 (2004): 1-9.

O’Hara, Daniel T. “On the Philological Imagina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boundary 2* 37.3 (2010): 1-3.

Said, Edward W. “Erich Auerbach, Critic of the Earthly World.” *boundary 2* 31.2 (2004): 11-34.

(編輯部)

進行中研究

文學傳記與微歷史間的雙向觀點

李祁芳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首先感謝比較文學學會的邀稿，讓國內的近代早期研究有一個敘事空間；在撰寫本文的同時，也讓我在教學之餘，沉澱反省自己的研究方法與觀察角度。

1. 我的學術養成

我的學術訓練在文藝復興文學與文化，在博士階段所從事的工作主要是文學批評與歷史考證。我的博士論文為 *Thomas Dekker and Chaucerian Re-Imaginations* 《湯瑪斯·德克爾與喬叟聯想》，此研究旨在提供學界全新的湯瑪斯·德克爾(c.1572-1632)文學傳記。¹此外，我在博論中並替德克爾的作品建立典據，詳載德克爾運用主要典據喬叟(Geoffrey Chaucer, c. 1343-1400)的作品於戲劇創作之思路與方法。我的研究方法在詮釋文本方面，除了運用基本的歷史語言學、書目學與文本解析的訓練外，還採用1980年代Stephen Greenblatt、Louis Adrian Montrose、Jonathan Dollimore、Alan Sinfield、Peter Stallybrass等文藝復興學者所使用的New Historicism以及Cultural Materialism的角度解析文本。在建構作者生平與文化脈絡方面，我採用了Clifford Geertz

¹ 此傳記研究是德克爾逝世後400年，在英國完成的第一本英文學術傳記。

對於文化人類學「深層描述」(thick description)之學理，做為傳記論述之基底，²試圖多面向地重構德克爾的生平、將德克爾還原於戲劇史與通俗文化，並且從德克爾的劇本合寫人(Anthony Munday、Henry Chettle、Michael Drayton、Thomas Middleton與John Webster)的作品中來審視、彰顯德克爾的戲劇成就，以重新評估、修正德克爾在文學史、戲劇史中的地位。我的博論以1590年代末期的玫瑰劇院為故事論述之起點，先分析德克爾在Philip Henslowe《戲劇帳冊》(*Henslowe's Diary*)中的重要性，其次探討德克爾在「戲劇戰爭」所執筆的部份，接著分析他的劇本、散文及在瘟疫年間其對倫敦的觀察，最後探討他的監禁歲月與死後的歷史評價。

為什麼要研究德克爾？我的研究目的有二：一方面除了要填補文藝復興戲劇史的空缺，一方面是希望以德克爾在戲劇上之實踐，來做為莎士比亞研究的比較對照組，藉此了解莎士比亞研究中所沒辦法探索到之文化面向。比如說，我們知道莎士比亞曾經跟不同作家合寫過許多劇本，跟George Peele寫過*Titus Andronicus*；跟Thomas Middleton合寫過*Macbeth*、*Measure for Measure*、*Timon of Athens*、*All's Well That Ends Well*；跟John Fletcher合寫過*The Two Noble Kinsmen*等。然而，莎士比亞並沒有留給後世太多的史料與直接證據讓我們建構他在戲劇創作的文化內涵，在缺乏直接證據的情況下，學界對於莎士比亞戲劇合寫的過程與內容所知非常有限，因此有必要從德克爾身上重構歷史，從德克爾的文本中尋找莎士比亞的蹤影，而從中推演莎士比亞的戲劇實踐，以建構劇作家複雜的網絡與劇

² “Thick description”原為Gilbert Ryle所用，由Clifford Geertz發展其內涵與文化實踐，見Clifford Geertz 1973。

場文化史。此外，德克爾的一生有 60 年，是文藝復興作家中，少數經歷三個朝代（伊麗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與查爾斯一世）的作者。研究德克爾不僅可從中一窺政治轉變所產生的文化態度，更可從中飽覽社會與文化價值觀的脈動與文化衝突。從德克爾的世界，我們更可評估莎士比亞研究中一些不確定的假設與猜測。

身為德克爾傳記的執筆人，我的學術立場必須要不斷強調、彰顯德克爾「個人」對於十六、十七世紀大文化、大環境的貢獻與重要性，以及德克爾給予其他作家的影響與衝擊，因此我的論述立場必須是「因為德克爾的存在，所以我們知道……」。然而，我在尋找文史證據、在嘗試解開歷史謎題的同時，我所扮演的角色是文史偵探，這個角色的立場完全異於德克爾的代言人：偵探必須跟眾多研究對象保持距離，抽離情感以做客觀公正的判斷。多年來，我嘗試以第三者的角度來觀察我在進行研究時所衍生的兩種立場：作為傳記作者，我經常太接近、太強調我的研究主角，而忽略掉某些重要人物與背景；作為文史偵探，我有時會太靠近細節而忘了提出一些更大、更有意義的歷史問題。研究進行間，我看到自己的盲點與方法上的侷限，想對此做出根本的突破。

2. 微歷史 (Microhistory)

「微歷史」是我在博班時期受到 Bernard Capp (沃瑞克大學 [University of Warwick] 榮譽退休教授) 與 Steve Hindle (前沃瑞克大學歷史學教授，現為 W. M. Keck Foundation Director of Research at the Huntington Library) 的影響而開始接觸的一種史學方法，可解決我上述之盲點。文藝復興運動起源於義大利，

其治學方法受義大利學派影響甚深，1970 年代義大利開始有近代早期的歷史學家提倡著手從事「小」區域近代史研究。相較於傳統史學 (macrohistory) 只聚焦探討權力結構中心的大主題，如國家、社會、大城市、大人物之「非凡」歷史而特意忽略「不重要」(insignificant) 的小人物；微歷史所提倡的研究重點以權力結構中心以外的對象為主，如小教區、小市民、小村莊、甚至是不見經傳的個人或小鎮。當傳統的宏觀史家對「大」的歷史事件做出提問，微歷史史學家的提問是針對「小人物、小地方背後的大問題」(Joyner 1999)。Walt Woodward 的文章中提到，微歷史史學家之研究觀點，就好比 William Blake 在 *Auguries of Innocence* 所提到的「一沙一世界」(“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Woodward 1999)。微歷史史學派的研究起點雖然以「小」窺「大」，但其目的在調查「大」文化環境對於「小」個人或「小」事件所造成之衝擊與影響層面，盡可能不以偏概全地從中探索、重構造就小人物思想的文化、社會史。微歷史的獨特之處又不同於社會學的個案調查，因為傳統的社會科學研究鮮少會再探究更深層次的歷史問題 (Ginzburg 1993)。微歷史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作是 Carlo Ginzburg 的《乳酪與蠕蟲：一個十六世紀磨坊工人的宇宙觀》(*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1976)。Ginzburg 有一次在十六世紀大審判的文獻中意外發現義大利 Friuli 小鎮的磨坊工人 Domenico Scandella 在大審判的答辯時所呈現的宗教宇宙觀，不妥協於天主教以「神」為造物主的宇宙觀。被告 Domenico Scandella 在答辯時說：「世界本來就有腐敗墮落的根源……這世界原本一團混沌 (chaos)，是由地水火風混合所組成，這種混沌慢慢地形成

了團塊，就好比是從由牛奶提煉出來的乳酪，蠕蟲在乳酪中形成，它們是天使……」。因為他的異端信仰，Scandella 被燒死在十字架上。Ginzburg 在此書 62 篇故事揭露小人物在（反）宗教改革的大審判下，菁英文化與通俗文化（民間信仰）間的衝突所帶給磨坊工人的思想衝擊，Ginzburg 並追溯 Scandella 所閱讀的所有書籍，藉此探索並建構造就了小人物 Scandella 個人宇宙觀的文化社會史。Ginzburg 的學術創舉除了由文獻史料重構磨坊工人的一生外（傳記式論述），在探索大文化大環境給予小市民的影響上，提出重要結論：磨坊工人的信仰乃源自於根深蒂固的農夫口傳信仰傳統，這種傳統不僅早於基督教，也因大環境適應了基督教，但終究不敵宗教在印刷術上的勝利。Ginzburg 的貢獻獨創一格，因為他融合了 Geertz 的「深層描述」手法，實踐人類學對於文化的看法，將之當作是具有歷史特殊性意義的系統。微歷史在 1980、1990 年代對法、德史學家的影響甚深，對美國歷史學家的影響也是有的，如 Natalie Zemon Davis 的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1983) 與 *Women on the Margins: 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 (1997)。微歷史研究方法甚至影響了耶魯大學中國史學家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的著作《婦人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 (*The Death of Woman Wang*, 1978) 與《胡若望的疑問》 (*The Question of Hu*, 1987)。

Ginzburg 的研究對我影響甚深，因為從 Ginzburg 的作品，我看到解決盲點的方法：相較於大作家 Spenser、Shakespeare、Marlowe 與 Jonson，我的德克爾是一名看似「不重要」的作家，但是他與前述作家幾乎是處於同一時代，我如果運用 Ginzburg 的研究方法，尋找在 1572-1632 間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在「大」文學傳記的框架下，做一些與文學史相

關的歷史提問，並從提問中建構以德克爾為中心的微歷史，將幫助我自己與德克爾保持足夠的距離，進而看到大文化環境下造就德克爾的文化因子，如此一來，我的批判式學術傳記出版計畫 (critical biography) 內容將會更加嚴謹縝密。國際學界目前有許多研究都是交叉使用文學傳記、深層描述與微歷史之方法來呈現研究內容，如 Hermione Lee 的傳記研究方法 *Body Parts: Essays on Life Writing* (2008)、James Shapiro 的 *1599: A Year in the Life of Shakespeare* (2006)、Charles Nicholl 的 *Shakespeare the Lodger on the Silver Street* (2008)、Julie Stone Peters 的 *Theatre of the Book 1480-1880: Print, Text, and Performance in Europe* (2008) 等書都是優秀範本。

3. 文學傳記與微歷史間的「記／寄存空間」³

歷史空間十分寬廣有趣，這幾年我在建構德克爾研究雙重脈絡的同時（文藝復興 VS 中世紀後期 / 文藝復興 VS 古典傳統），一直游走在文學傳記與微歷史之間的「記／寄存空間」（archival space），因為我的研究必須要納入文學傳記與微歷史間的雙向觀點，才能公正厚實。⁴ 反省自己從 2009 年畢業到現在的四年間完成了什麼研究？我想我在我的德克爾研究計畫中問了幾個大的歷史問題，這些問題我找到了答案，並且在最合適的地方出版。第一個大問題乃聚焦在「小」作家德克爾與「大」作家喬叟的劇場關係，例如，

³ 「記／寄存空間」（archival space）這個美麗的譯名是第 35 屆比較文學會議的大會主題。

⁴ 哈佛大學美國史教授 Jill Lepore 在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的一篇文章 “Historians Who Love Too Much: Reflections on Microhistory and Biography” 觀察到文學傳記與微歷史間的微妙關係，在方法學上的反省提出四個命題，見 Lepore 141。

我如何從德克爾作品的小小蛛絲馬跡中看到背後運用典據的創造過程與學理？當我發現重要史實而提出結論（「《喬叟全集》對文藝復興時期劇作家們而言是一部的重要典據，因為相較於須耗時閱讀的古典拉丁文獻，《喬叟全集》裡所使用的方言及戲劇語言的文法，本身構成一種特殊捷徑與劇場實踐的方法論，可方便劇作家們迅速編寫故事與情節，以因應劇院需求」）之時，這種劇場文化又告訴了我們甚麼？我想我這篇文章暗示國際學界，如果德克爾與他所有的合寫人都視喬叟作品為捷徑，那麼莎士比亞運用喬叟的方法也不會相去太遠（Li 2012a）。⁵ 我的第二個大問題乃聚焦於德克爾與平民史家約翰·史鐸（John Stow）的歷史關係與定位，例如，對倫敦史有深入了解的德克爾的地方史知識從哪裡來？他為什麼要閱讀史鐸？史鐸與喬叟又有麼關係？我的答案是，史鐸的作品之所以被大眾所閱讀是因為方言文學在十六世紀的知識生產有重要地位（Li 2011），而十六世紀的知識生產又與英格蘭的國家轉型息息相關。我從德克爾對喬叟與史鐸的書寫關係中，看到了英格蘭文化自覺的表現乃建立在喬叟與史鐸本土論述的文化表現與歷史意識上，英格蘭用之來建立新傳統，這點發現對於十六世紀英格蘭新國家文明的建立可以提出具體的佐證。我的第三個大問題乃聚焦在德克爾在1604年改朝換代時，創造英格蘭／英國國家城市慶典時，閱讀與轉譯古羅馬詩人維吉爾（Virgil）的帝國主張（*translation studii et imperii*）所呈現之文化態度，例如，為什麼德克爾在運用維吉爾傳統做國家論述時的主張與 Jonson 不同？1604年的改朝換代與瘟疫所帶

⁵ 本論文獲選為 Routledge 優良學術期刊文史類“Literature Timeline”最佳代表論文之一，見 <http://www.tandf.co.uk/journals/explore/literature-timeline.pdf>。

來的災難給德克爾什麼樣的文化衝擊？這種衝擊又有甚麼文化意義？我的結論是，從德克爾的作品中我們可清楚看見英格蘭人民對於新國王詹姆士一世的文化抗拒反映在對舊王伊麗莎白一世的懷念，維吉爾傳統在英格蘭／英國城市慶典的文化表現一方面必須呈現出實踐帝國轉譯之決心與抱負，因為歷史必須要前進，一方面也必須藉由重述維吉爾的土地論述與地方土地色彩，來告知朝廷民間抗拒改變的文化意見（Li 2012b）。

4. 德克爾與密道頓的關係與定位

以上這些研究成果只是邊探索邊練習的小作，可以再延伸探討的還很多，研究不斷進行，我沒有「已完成」（finished）的計畫，有些想法現在必須暫時擱著，等它們沉澱才能看得更透徹。以上這些微歷史研究是我目前“Dekker-Middleton Connection”計畫之研究基礎，這個計畫的研究提問是：為什麼密道頓要選擇德克爾做為合寫人？德克爾對密道頓之影響是如何產生？他們的合作是基於什麼理由與立場？兩人合作的戲劇模式有何意義與特殊性？當文本本身並不足以清晰勾勒出作家充滿文化意涵的複雜生命網絡之文化圖像時，有必要藉由微歷史之方法，深入挖掘文本外的文史脈絡以及可以闡明德克爾與密道頓之合作關係的一系列寫作活動，來考究德克爾與密道頓戲劇合寫模式之本質、多樣性、特殊性以及該合寫模式在戲劇合寫一環裡的重要性。今年七月即將到倫敦大學發表小作“Dekker-Middleton Connection: A Cultural Life in the Years of Crisis”，希望從社群對話中可以修正自己的淺見，以「歷史修正論」（historical revisionism）的角度，突破自己對德克爾的局限性思考。

引用書目

- Capp, Bernard. *The World of John Taylor, the Water-Poet 1578-1653*. Oxford: Clarendon, 1994.
- Davis, Natalie Zemon.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83.
- . *Women on the Margin: Three Seventeenth-century Liv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P, 1995.
- Geertz, Cliff.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ive Theory of Cul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3-30.
- Ginzburg, Carlo.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London: Routledge, 1976.
- . "Microhistory: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It." *Critical Inquiry* 20.1 (1993): 10-35.
- Hindle, Steve. *On the Parish? The Micro-Politics of Poor Relief in Rural England, c.1550-1750*. Oxford: Clarendon, 2004.
- Joyner, Charles W. *Shared Traditions: Southern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Urbana: U of Illinois, 1999.
- Lepore, Jill. "Historians Who Love Too Much: Reflections on Microhistory and Biograph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88.1 (2001): 129-44.
- Lee, Hermione. *Body Parts: Essays on Life Writ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2008.
- Li, Chi-fang Sophia. "John Stow's *Survey of London* (1603) as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Dekker's *Dead Tearn* (1608)." *Notes and Queries* 58.2 (2011): 274-78.
- . "Inheriting the Legacy: Dekker Reading Chaucer." *English Studies* 93.1 (2012a): 14-42.
- . "Finding Voices in Virgil: Dekker's Virgilian Approach to *The Magnificent Entertainment* (1604)." *Notes and Queries* 59.4 (2012b): 560-67.
- Nicholl, Charles. *The Lodger: Shakespeare on Silver Street*. London: Penguin, 2008.
- Peters, Julie Stone. *Theatre of the Book 1480-1880: Print, Text, and Performance in Europe*. Oxford: Oxford UP, 2000.
- Shapiro, James. *1599: A Year in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London: Faber & Faber, 2006.
- Woodward, Walt. "Historians to Debate Value of New Historical Approach – Oct. 11, 1999." UConn Advance, <<http://advance.uconn.edu/1999/991011/10119912.htm>>.

魔術與後人

蘇秋華

東吳大學英文系

近年來我所進行的研究是從後人類的觀點探討十九世紀魔術舞台到電影前史，尤其重視維多利亞時期的光電技術與現代性思維的聯結。藉由探討現代科技初始年代的科技與想像，我希望能夠重思「人」的形塑。

維多利亞時期是人們能夠較為熟練地運用各種光學及電磁技術的年代，但由於技術未能真正普及到日常生活當中，所以常作為娛樂用途，其中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莫過於魔術舞台當中用來製造幻景的種種技術。更成熟的光電技術使得資訊能以更快速、甚至無時差的方式傳播，進而引發了二十世紀資訊革命，已有許多論者對資訊時代的「人」的概念作出精采評述（例如：Bernard Stiegler、Bruno Latour、Andrian MacKenzie、Marshall McLuhan 等），然而我更關注的是從前現代機械技術，進入到現代光電技術的十九世紀，因為我認為維多利亞時期對於即將引爆革命的光電技術有許多有趣的想像，有助於探討所謂的「現代性」與「人」的關係。

2011年，我在《英美文學評論》所發表的論文處理的是海德格與斯蒂格勒對技術與時間的闡釋，希望借此開發出斯氏理論之後人潛能。斯蒂格勒之《技術與時間》（*Technics and Time*）其實是有意地與海德格之現象學巨著《存在與時間》（*Being and Time*）進行對話，對海氏所提出之技術與此有（Dasein）的關係作出批判，並據此針對當代資訊媒材發展批判理論。簡而言之，海氏認為此有（或者，如斯氏修正後的說法「某」〔who〕）的存有

乃是一種出離（ecstasy），⁶ 也就是說，由於肉身記憶之無法永存，⁷ 而必須將記憶寄存於肉身之外。以工匠與工具的關係為例，工匠在日常工作當中，因長時間反覆操持某些工具，而在這些工具上留下生活的記憶，這樣的記憶將隨著同樣的生產技術下所使用的工具而傳遞給同時代的工作者。換句話說，物、身體技術、記憶之間存在著微妙的張力。如果以這樣的觀點來考量「歷史」作為透過各種記憶技術所保留下來的群體記憶，我們不難發現，海氏的論點即隱含著某種顛覆力量，即，記憶的存留並不是人類超然於物的意識所能完全掌控。可惜這樣的論點在海氏一貫曖昧的風格當中未能明確揭露，而成為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的重要洞見。歷史建構出我們稱之為「人」的存有，然而從古埃及人所使用泥版及封印，到各項書寫乃至印刷技術的發展，甚至除了語言文字之外，聲音與影像的保留，其中所涉及的技术問題一再挑戰了人作為歷史主角的迷思。每個時代的技術必然地限制並篩選了可被留存的記憶，也因此，正如德希達在《典藏熱》（*Archive Fever*）裡所提醒的：「收藏典藏的技術結構亦決定了可被收藏的內容……建置典藏在記錄的同時亦生產出事件」（17）。因此，我們必須要問，如果「人」是透過歷史來認識自己，那麼我們在歷史之鏡中（能夠）看到的究竟是什麼？

⁶此處 ecstasy 是按照廖朝陽教授的翻譯。

⁷ 斯氏在《技術與時間》中亦對胡塞爾之時間意識作出精采闡述。其重要論點「第三記憶」(tertiary retention)，便是斯氏根據胡塞爾在《論內在時間意識之現象學（1893-1917）》（*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 [1893-1917]*）中所說明之原初及第二記憶所作的批判及延伸。此部份是筆者目前國科會專題計畫中所處理的問題。

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中所挑戰的，便是「工匠人」（*homo faber*）的人本主義迷思。人利用工具對週遭環境進行改造，暗示的仍是意識先行的假想，然而斯氏試著對此重新思考並予以修正，進而提出是技術開啟了時間，開展「某」的歷史。對他而言，光是承認人的存在樣貌是出離並不足夠，經由長期身體技術的積累所形構的技術無意識，才真正架座（enframe）了「某」。簡而言之，技術並不是實現人們願望的工具而已，而是在提供人的可能性的同時，以更深層的形式框限了人。斯氏更透過重新詮釋胡塞爾的時間意識來說明，所謂人的時間意識也早已由記憶技術所框架。他指出，不同時期的記憶技術亦使「某」的時間意識產生變化，然而不論是海德格對工具—人關係的洞見，或胡塞爾對時間意識的精采闡述，都不足說明資訊時代中，利用各種以光電為基礎的記憶技術對「某」所帶來的結構性變化，而這正是《技術與時間》試圖處理的主題。對斯氏而言，光學電磁技術的發展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其意義不僅在於科技所帶來的現代性，而在於強調序列化及數字化之無時差資訊技術，抹平了「某」的時間觀，因為無時差的即時資訊傳遞代表的亦是無未來，而更令人憂心的是，以此為基礎的現代記憶技術象徵了「某」的記憶終極外化，現代的「某」在記憶全面工業化之下，失去了想像的能力，也萬劫不復地走向一個機械人的世界。

我認為，斯蒂格勒在重新思索技術與人的關係上所作的闡釋儘管十分精采，但對於現代光電科技的態度卻表現出極度的悲觀與不信任。事實上，斯氏對現代大眾傳播的不信任感在在呼應法蘭克福學派對真／假，實／

虛的二元對立式理路，⁸ 也因此限縮了其理論可能開展的後人類論述潛力。若根據他的理論，記憶技術不只有將經驗過的生活記憶留存下來而已，而在技術的採行之中亦改變了「某」的感覺結構，那麼我想提出的是，現代性所帶來的光電科技並不盡然會引致人類知覺能力的縮減，反而可能會是提昇。可惜斯蒂格勒似乎不打算從中挖掘出更多元的可能性，反而一再強調現代性類比及數位錄製技術之「精確記錄」的功能終將引致個體性的喪失。因此我希望能夠回溯電磁技術初始的維多利亞時期，藉由當時大眾娛樂對於電磁技術的使用，對斯氏的某些假設作出回應。

首先，斯氏將電影視為現代性記憶技術的里程碑，並強調其「精確記錄」功能，這樣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若追溯前電影技術史，其實不難發覺，早期與電影相關的影音錄製技術，像是攝影及留聲機，其用途並不盡然是精確記錄現實。事實上，維多利亞時期對於現代科技的種種發展，是以一種浪漫詭奇的方式來覺知的。以攝影為例，當時已有各種玩弄曝光技術來製造的靈魂攝影（spirit photography），且醫療上用來透視人體的 X 光照亦激發無盡的鬼魅想像，而無線電的發明最早的目的是為了聆聽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聲音。與其說光學電磁技術精確記錄了真實，不如說它製造出融合了光怪陸離與理性庸碌的維多利亞世界。同時這些技術也被用來忠實再現所謂的現實世界。

而最仰賴這些光電技術的，正是當時適逢黃金年代的魔術舞台。魔術師們藉由各種道具創造出靈異的、神祕的、童話的、古怪的

⁸可參考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在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中，對現代性及文化產業的討論，其所採取的立場暗示的便是這樣的二元式思維。

、恐怖的幻景。我認為，當時的魔術幻景當中，也藏有多重對「身體」的離奇想像，例如飛天的人體、與機具合而為一的破碎人體、能夠分解成原子微粒再重組的人體，亦或是被具像化成腦漿狀的靈體等。令人不禁要問，光電技術對「人」的概念究竟起了什麼樣的化學變化？更確切來說，若技術展開了一個時代，以工具理性為依歸的「現代人」，又是如何被形塑出來？

此外，若探究電影的起源，一般多溯及盧米耶兄弟的紀錄短片，然而近年來的電影史研究已開始重視舞台魔術師對電影的貢獻。與盧米耶同時期的舞台魔術師梅利耶（Georges Méliès）自購入第一架可錄製活動影像的機具之後，便嘗試開發這項新媒材的各種可能性，例如：剪接、淡入淡出、多重曝光等，來製造魔術效果。由他所製作的電影，成品往往是夢幻凌駕現實，也因此他被稱為「特效之父」。換句話說，我們用來留存記憶的媒體之「精確記錄」功能並非它們的全貌，光電技術在早期發展上通常是用來製造不真實而詭異的效果。那麼，當「某」透過存放於外的記憶來定義並修正自己時，其記憶典藏庫中又有多少「非真」或「想像」的元素？

從魔術的角度來重新審視電影作為記憶技術，其實不難發現斯蒂格勒理論的不足之處。即便在光電科技主導的今日，數位化和序列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某」也非必定成為無想像無深度的枯竭心靈。我最近幾年的研究，便是從這樣的論點出發，試著討論維多利亞時期的文本當中可能受到魔術舞台影響的部份，從中探討在光電科技下對身體、時間、知覺的想像，希望能夠在悲觀與哀悼的路徑之外，找出更豐富的「後人」可能。

引用書目

- Derrida, Jacques.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Trans. Eric Prenowitz. Chicago: U of Chicago P, 1996.
-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1962.
- Horkheimer, Max, and Theodor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Trans. Edmund Jephcott. Stanford: Stanford UP, 2002.
- Husserl, Edmund.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 (1893-1917)*. Trans. John Barnett Brough.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1991.
- Stiegler, Bernard. *Technics and Time*. 3 vol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8-2010.
- 蘇秋華。〈從日常生活到可程式性：以十九世紀魔術舞台探討斯蒂格勒理論之後人類潛能〉
。《英美文學評論》18 (2011): 33-69。

讀書筆記

關於左拉

蔡淑玲

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無心插柳，關心起左拉的自然主義。奇怪的是，和之前的閱讀，方向相反卻隱隱然自有關連。從符號系統的建構與制約一路走來，在十字路口上，遇到了難題。困惑，因提問找不到答案。文字符號與物質感官，若真的分離成兩個不相干的軌道，各自運作，那麼所有建立在地震斷層帶上的城市，該如何思考生生不息？原創的動力從何而來？人的力量可以無限上綱到哪個層次？「自然」是什麼？古老的提問乃左拉自然主義的初衷。遺傳環境並非宿命，只是路徑之一，藉以觀察實驗，探求世間規則與自然法則之間的運作關連；探論條規體系如何限制主導了生活模式與想法，以至命運。左拉也不追求「絕對客觀」，而是想由文學藝術實驗探求自然之為「客體」，到底是人為度量之外的「絕對他方」，無法全然界定？或者，內蘊於存在之中，在世的有限主體透過存在的差異，仍得以證悟？或者，困囿在社會政治體系下，生命等於過日子，只能逐步走向頹敗的悲劇？

若說自然（Nature）既是被文化編碼的已然（nature），亦是不斷復返無法被人為制約的未然（nature），社會人間身處自然律動之中，往往忘卻「環境」其實只是時空框架下一時的章法組織，可隨著生命互動激發的強度形變更動。左拉以科學醫學等觀察實驗

方法重探文學藝術，為的是探究文明與自然之間的互動法則。而藝術文學作品被視為實驗成果的美學表現，呈現的是自然在現實中可能具相的已然，因此具有積極的反省觸新作用。虛構之相亦內蘊實象之變化。尋找生命自然本相之表現，乃是左拉的目標。上溯至 techné 和 art 的淵源，文學藝術一如科技，乃人類研發轉譯自然技術，探求真理所凝聚的成果。

從自然轉譯技術的研發來看左拉的文學藝術觀，有助於進一步了解左拉探究現代性的介入態度：對所處的現在之掌握與了解、存在處境的組織、權力部署、關係配置、供需分配等，牽涉的似乎就是生命政治的內容。弔詭的是：轉譯技術再怎麼研發，皆有侷限；縫隙中猶見幽明兀自閃現。主動的觀察實驗中，猶須被動等待真實的觸發，捕捉意義的方向，竟才是創作之依歸。生命政治於焉轉向生命與生態哲學。列維納斯比較左拉與沙特時說：至少，左拉沒有藉由虛無無限上綱存在界說的權力。在追溯左拉與現代思潮的關連中，重讀白朗修的《黑暗托馬》也似乎明白了為什麼系列版本衍化下來，字愈來愈少，書愈來愈薄，小說濃縮成敘說。大幅刪掉的章節，亦即「自然」。幽而簡，簡而白，白而默。默，或可重生？

這提問，因「絕對」，從來無關乎「絕對」。

「同志生活作為方法」論壇（續）

編按

本學會於 3 月 23 日假台北書林書店舉辦「同志生活作為方法」論壇，上期已刊出主講人康文慶教授發言內容摘要，本期附上與談人之一林純德教授的回應內容節錄。

回應 “‘Sexual Happiness’ of the Unfortunate”

林純德

文化大學大眾傳播系

關於文慶，在座一些朋友應該不會陌生，他是中國男男情慾史研究的國際知名學者，這次前來與大家分享刻正進行中的「不幸人群的『性福』：社會主義時期的男男性關係」的研究計畫成果。我有幸可以事先閱讀他所提供的初稿（內容精闢且深富啟發性，令人欲罷不能），謹在此提供幾項個人感言與想法。

- 一、在“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一文中，美國同志史學者 D’Emilio 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闡述資本主義與美國同志認同型塑、同志社群興起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他指出，美國同志認同為十九世紀後期社會建構下的產物，亦即，當資本主義的勞力自由體制開始盛行，使個體得以藉由出賣勞力而自主謀生並於經濟上不再依賴傳統家庭之際，同志的情慾方能輸往且轉化為一種在異性戀家庭體制之外所建構而成的關涉同性情慾生活的個人身分認同，並進而與其他個體共同形成同志社群。D’Emilio 的研究凸顯了資本主義與美國同志社群之間的複雜關係；然而，文慶的研究則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視野，藉以探索社會主義與中國同志／酷兒認同型塑、同志／酷兒社群興起之間所可能存在的動能關係，這是相當值得關注的。
- 二、文慶的研究結果指出，一直被認定為情慾壓抑的毛澤東社會主義年代反而是充

滿男男情慾實踐動能的時期；反諷的是，象徵中國與世界（性）文明接軌的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卻開始出現大規模逮捕男同性戀者的行動。在台灣，後戒嚴時期的 1990 年代起，在主流女性主義者的主導下，台灣當局開始進行一連串關乎「性」及「性別」的修法與立法。此一被視為服膺全球性別治理的行動其實潛藏著主流女性主義者與當權者共謀下的某種思維：凡是不好的、有待糾正的都將它列為與「性」有關；反之，只要是正向而有待培力的就歸屬「性別」。因此，我們不難想像此一修／立法所可能產生的最惡質的效應之一便是侵犯到性／別少數的「性權」。

三、文慶的深度訪談對象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之一當屬「毛線婆娘」。這位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年代活過來的年長酷兒，雖然在當今的大陸男同情慾配置中恐已被邊緣化，但其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精彩男男情慾實踐史是極其珍貴的，但我感到好奇的是，大陸當今的同運活躍份子在驕傲、陽光、主流化的運動進程調性下，如何看待、回應、安置「毛線婆娘」這類的又老、又娘、又淫亂的「非正典」男同志？